

主編 李文生 張鴻祥

汀江與客家人

理論研討會論文集



南源永芳集團公司 汀州客家研究會編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出版

汀江与客家人

主 编

李文生 张鸿祥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京)新登字 148 号

汀江与客家人

李文生 张鸿祥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郊定福庄 1 号)

福建省武平县方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7.875 印张 191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7.00 元

ISBN7-81004-524-5/K·24

序

姚美良

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支优秀民系，其独特的形成历史以及对
中国和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非凡贡献，引起世人瞩目。由此应运而生
了一门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客家学。专家学者们对客家
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建筑、语言、宗族、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成绩斐然。

汀州作为客家祖籍地和客家文化中心之一而誉满海内外。源
于长汀境内的汀江，千百年来滋润闽粤客家地区的沃野田畴、孕育
祖祖辈辈客家子孙，被誉为客家母亲河。近年来，海内外客属乡亲
纷纷组织客家文化寻根团和祭祖团来汀州寻根谒祖。一九九五和
一九九六年金秋，世界客属两度云集古城汀州，举行隆重的公祭客
家母亲河大典，而为世人所瞩目，在世界客家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
页。

近年来，我倡导客家祭祖活动，旨在回归认宗的活动中增进世
界客属的凝聚力，以达到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振兴中华
的目的。我近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以“孙中山与华侨国际书画
展”为中心，弘扬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伟大精神；另一方面是
积极推动弘扬优秀文化。汀州是客家母亲河汀江的源头重镇和客
家首府，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汀州厚重的历史积淀为客家学提
供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汀州举行的两届公祭母亲河活动中
有识之士主张成立中国（汀州）客家研究中心基金会，以期对客家

学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为了更深层的研究汀州客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挖掘客家社区的种种事象,分析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期推动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客家祖籍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我倡议召开“汀江与客家人”学术研讨会,正是基于这个理念。

国内专家学者积极响应,呈现诸多卓见。各位舟车劳顿,辗转来汀,将客家研究推向更高领域,借此深表谢忱之意。现将研讨会部份优秀论文结集成册,刊行于世,以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支持和关注客家学的研究,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于香港

目 录

序.....	姚美良(1)
“客家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孔永松(1)
汀州客家的海洋性移民.....	杨国桢(8)
试论客家文化的源头	杨鹤书(18)
客家文化象征研究	曾少聪(25)
从汀州历史上住民成份变化探讨该地区客家 和客家文化的来源及其形成	蒋炳钊(36)
汀江与客家文明	李文生(46)
“文化地图”解读	彭兆荣(58)
略论梅江文化与汀江文化的渊源关系	赖雨桐(67)
汀州汀江与韩江水系客家移民	吴金夫(75)
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洪友(81)
客家“移民复古风”——太平天国金田 起义真相	刘佐泉(96)
汀州客家人的革命精神.....	张鸿祥(103)
客家与中原关系刍论.....	王大良(110)
客家谱牒中的“欧苏法式”探讨.....	安国楼(127)
崇尚教育的汀州客家人.....	胡大新(135)
客家谚语与客家人的道德观.....	练春招(144)
客家人的迁徙与其文化特征的形成.....	刘春喜(150)
客家地区二次葬成因质疑.....	张维耿(156)

赣南客家女性生命礼俗浅探·····	谢庐明(160)
隘子客家大庙神明崇拜与汀江	
流域的渊源关系·····	曾祥委(174)
闽荡香港的客家人·····	刘加洪(182)
深圳泥岗村客民语言走向·····	刘丽川(193)
萍乡一带客家人与清初赣西山区的棚民起义	
·····	刘美崧(205)
浅谈汀州客家道教祭祀的舞蹈艺术·····	李秀荣(213)
汀龙会馆:客家文化凝聚精神的实证·····	王日根(219)
唐宋汀江流域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	
述论·····	葛文清(228)
后记·····	(244)

“客家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孔永松

“客家学”经罗香林教授的倡导，已成一门独立学科。近年来，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襄助，广大学者的潜心研究下，写出了不少专著与论文，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客家学”研讨会，林林总总、硕果累累。刘佐泉先生、王东先生等均对“客家学”研究作了历史回顾，对近一个世纪来“客家学”研究的论著作了统计与编目，客观地指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为把“客家学”建成全面而又系统的学科，希望客家籍与非客家籍的学者都介入，打破以往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一致性格局；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各学科都应参加，从全方位、多层面地研究客家。使“客家学”成为当代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支系。以自己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为人类不断地了解自身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乘这次《汀江与客家人》又一次学术研讨的盛会，对“客家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提点看法，以就教于学者专家。

.

一、“客家学”与“汉族学”研究的关系

“客家学”是汉族的一个支脉（大多学者认同罗香林先生于50年代提出的，客家人的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因此，我认为要研究好“客家学”或客家史，首先要研究好“汉族学”或汉族

史。只有把“客家学”的研究放在“汉族学”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不了解汉民族及汉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就不可能准确把握客家民系及客家文化的研究。问题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 90% 以上,占世界人口 1/5,但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的《汉族史》,民族学研究中也没有“汉族学”,还没有编出《汉族志》或《汉族概况》。这一方面与汉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地位和影响不相称,另一方面也给汉族各民系(自然也包括客家民系)研究带来困难。

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夏以前,中华大地上只有氏族或部落,尚未形成民族。夏以后,华夏部落(生产力水平较高)与夷、狄、戎、蛮各部落(生产力水平较低),经过激烈的撞击和融合,历夏、商、周三代。在华夷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共同语言,共同服饰、习俗,以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汉朝的建立,至汉武帝时,这个民族被周边民族(或部落)的人民称为汉人(汉族),先是他称后成自称。汉民族是民族融合体,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认同,既有血缘关系(不是主要的),但主要的是文化认同。汉民族经过反复不断的由北向南移民,在南方与“百越”民族(包括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海、南越、西瓯等等)的后裔融合而形成吴、赣、湘、闽(福老)、粤(广府)、客家六大民系。民系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同时也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与南方诸民族的融合体。

二、“客家史”与“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关系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由于北方汉民向南移民造成的。因此,研究“客家学”或“客家史”必须研究中国移民史,特别是汉民族的移民史。可以这样说,汉族的形成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部移民史。移民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移民促进了民族的

融合也产生了新的民系或民族(如回族就是移民的产物)。传说中黄帝就是迁来迁去的。商朝至盘庚迁殷才定居。周人由黄土高原迁入关中平原。汉民族形成后,汉民大规模南迁有五次说,六次说,九次说等等。大规模迁徙、战乱、灾祸,这是显性原因。除了大规模迁徙,还有平时的不断的反复的迁徙,其数量也是很大的,绝不是少数流民而已。大规模移民,除战乱、灾祸显性原因外,有其隐性的也是终极的经济原因:即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问题。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统治者——地主、贵族、皇族,拥有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处于少地或无地的境地,他们必须把收获物的40%、50%甚至80%交给封建统治者享用,除地租外,农民还要承受赋役和高利贷的盘剥。农民无法生存被迫纷纷逃亡。因此,既要看到一个短期内因事件造成的爆发迁移,也不能忽视长期缓慢的连续性迁移,汉人南迁第一次高潮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及其后长达百余年的“五胡乱华”。这次移民总人口达90余万。^①这次移民迁入地可分东西2区:东区为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西区为长江上游及汉水流域。这次移民尚未进入闽粤赣边区,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无涉,因之不能称为客家先民。但对吴系(罗香林先生所概括的越海系)、湘系(罗先生所指湘赣系)的形成关系极大,可以说是吴系、湘系的先民。吴系、湘系的先民除主体是南迁的汉民外,还包括原土著居民——百越族人。

汉人南迁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唐中叶“安史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延及五代时期,第二次南迁高潮中,经王东先生考证,大批汉人分三种类型,三大途径进入闽粤赣边区(形成客家民系的大本营)。^②

如把“客家学”放在“汉族学”、“中国移民史”的大历史背景中

①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

② 王东《客家学导论》第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进行研究,对目前“客家学”研究中一些争论的热点问题,如“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界定、“客家先民”的概念、客家称谓的由来,客家是不是纯血统?客家民系主体是南迁汉人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越族人等等,就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结论。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汉民族有几支民系,因孤陋寡闻,目前尚未看到这类研究成果。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的学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民系可谓是民族的地域性分支。民系的形成必备两大条件:一是地域条件。民系是特定时空的生成物。空间即“生存地域”,是形成民系的自然前提。二是方言。方言就是地方话,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既具地域性、也具群体性。方言是民系文化的载体,是识别和区划民系的第一要素。

客家民系是唐中叶“安史之乱”起至五代北方汉人大量迁入闽粤赣边区,在这里避战乱,养生息。闽粤赣边区是客家民系形成的特定空间。南迁闽粤赣边区的汉人(相对原土著居民人数较多、生产力水平较高)与居住在闽粤赣边区的畲(相对其他少数民族是人口最多)、瑶、僚、俚、奚、蛋、诸族经过漫长的融化(有的仍保持民族,如畲族的一部分,大部分被汉化),到宋末元初,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与不同群体的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吸收,形成了在古汉语基础上独自发展演变并吸收了百越语成分的汉语方言——客家话(先形成民系、后才有“客家人”、“客家话”称谓)。根据语言学家李如龙、罗美珍、邓小华的研究认为,“从客家方言共有的语言历史层次看,应该说它是晚唐五代之间与中原汉语分手,南下之后经过湘赣吴一带的动荡,宋代时在闽西赣南定型的,后来又在自已分布地域内发生了一些很具特色的变异”,“从词汇演变看,说客家方言分化于唐末,定型于宋代也是合适的”。^①到了北宋末年,生活在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处的“这一群体语言发生了不同于中原汉语的

^① 李如龙《客家方言的比较看客家的历史》,《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出版。

变化,既有继承古汉语的一面,又有独自的变化发生。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不随中原汉语发生相同或同步变化的现象,有自己的发展方式,终于演变为汉语的一个方言。这个群体也就成了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①方言的形成是民系形成的最主要标志。由此可说,客家民系形成于宋末之初。

根据民族学民系形成的理论,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自然可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所谓“客家先民”,笔者赞成许怀林先生的意见“客家先民”是指,“即客家所由脱胎的人群,他们本身不是客家,而是他们的后代中有人成了客家的成员”。这样,客家民系形成以前南迁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与原居住在闽粤赣边区的土著——古百越族的后裔(主要是畲族人),才是客家的先民。客家是由这两部分人脱胎而来的人群,他们的后代中有人成了客家成员。过去不把原土著居民看成“客家先民”是不够全面的,这有受客家是纯汉族血统论的影响。弄清了“客家先民”的内涵后,就不致把尚未形成客家民系,甚至与“客家先民”也挂不上钩的李世民、郭子仪、陈霸先、张九龄、薛仁贵、欧阳修、程颐、岳飞等都扯为客家人。

关于“客家”称谓的由来。“客家”的概念应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二是由唐中叶以后陆续迁入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与原居住的百越族后裔,经历漫长的融合与互动,于宋末形成了独特的方言;三是与南方各汉民系,存在大同小异的风俗、习惯。客家民系在宋末元初形成时是没有称谓的,到明中叶以后客家有了很大发展,人口大大增长,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促使他们继续向外迁移。如向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发展,与闽系(福老系)、粤系(广府系)相接触,其他南方汉民系均以所居地域相称,而对从闽粤赣边区外来的移民称为“客民”,“客家”,开始是他称,因

^① 罗美珍、邓小华《客家方言》,第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没轻蔑之意，也成了自称。明中叶以后，“客家”这一名词，便逐渐在地方和官府的文献中出现。这就是“客家”称谓的由来。至于有的学者说：“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客家“长期受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以及自身的血统优越感的关系，因而对畬族采取睥睨的态度，更谈不上与他们发生婚姻关系。”^①

相反地有的学者提出，客家主体是古越族，房学嘉先生在《客家源流探奥》中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中原南迁史，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又说：“客家共同体，是南迁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以上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如把“客家民系”形成的研究放在“汉族”形成的总体中进行考察，其不妥之处，是很容分辩的。

三、客家发展与江河的关系

在农业社会，江河是人民生活的命脉，也是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近年来河姆渡文化的发掘，应该说，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是比拟，从一个民族来说，母亲河不只是一个，而是多元的。

从客家民系来说，汀江是客家人的母亲河，当然没有问题。但应该说，赣江、梅江也是客家人的母亲河，赣江连系长江，对汉族人民南迁到江西南部以及闽西粤东起了很大作用。汀江、梅江使客家由大陆文化走向海洋文化，意义是很重大的。

^① 曾雄才《谈谈先于客家民系生活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土著居民的成分——兼与王增能〈客家与畬族的关系〉一文商榷》，《客家学研究》第二辑。

客家形成于宋末元初,发展于明清。明代(15世纪)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当时闽粤赣边区的经济是很发达的,如种蓝业、种烟业、印刷业(长汀的四堡)、造纸业等等,在这些种植业、手工业中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此时,中国也开始向海洋发展,客家人也开始走向世界。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强国之一。郑和七次下西洋;远航船队是当时最先进的,最庞大的,先后到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达了江海,非洲的东海岸,就差那么一点儿即绕过非洲好望角了。历史不容假设,但回忆历史时往往又喜用假设。假设郑和绕过了好望角,那么发现新大陆的是中国郑和,而不哥伦布。后来,明、清王朝实行海禁,使中国失去了向海洋发展的历史机遇,失机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到19世纪,中国清王朝已外强中干,英国成了海上霸权国家,鸦片战争后,清廷割让了香港,从此一个耻辱接一个耻辱。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诞生了,中国由弱转强,英国则由盛转衰,这是香港能胜利回归祖国的根本原因所在。香港今天成了龙羽下一颗明珠,这里也包含客家人的心血。再过十几天香港就要回归了。今天,我们在八闽客家首府长汀研讨客家学,这也是庆回归的行动之一。21世纪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我们的客家学研究,也应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发扬客家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胜利迎接21世纪,走向21世纪!

作者简介:孔永松,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汀州客家的海洋性移民

杨国桢

闽西客家聚居的汀州，在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上，都处于我国东部“向外用力”的海洋发展区域的边缘。明清两代，闽西、粤东是客家的中心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客家人从中心区不断地向外移民。受闽粤沿海海洋经济利益的吸引，在传统的西进、北上的内陆移民潮之外，又产生一股自发性、不规则流动的海洋性移民。

海洋性移民，狭义上指通过海洋航行的移民活动。但从海洋发展的全局去观察，受海洋经济利益驱动，向沿海即海洋发展区域流动的陆路移民，虽然只有一部分后来转化为海洋移民，但他们在移居地的生产、生活，已与海洋活动直接、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广义上也具有了海洋性。因此，我们把直接的海洋移民和间接的向海洋发展区域流动的移民，都列为海洋性移民的考察对象。

早在宋代，汀州还是北方移民接纳区时期，已有一些人沿着汀江向粤东梅江流域和韩江流域移动。元代，再迁移到岭南海洋发展区内，如刘氏宋时从宁化迁潮州，再迁惠州，元初迁宝安（今深圳）西乡流塘；^① 吴氏宋自宁化迁惠州再迁东莞，元末迁九龙（今属香港）衙前围。^② 但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受着政治动乱的影响，大多不是经济性的移民。

^① 注：《宝安西乡流塘刘氏族谱》。

^② 《九龙衙前围吴氏重修族谱》。

明代中叶,闽粤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葡萄牙人的东来,刺激了“下海”“通蕃”贸易的兴起。晚明时期,闽粤沿海呈现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并与东南亚以至西方市场产生互动,海洋移民成为一股潮流。客家中心区向闽东南、潮汕、岭南的人口移动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带有经济移民的性质。同时,直接的海洋移民也开始了。

汀州移民海外,记载最早的有流寓暹罗(今泰国)的谢文彬:“成化十三年(1477年),王遣使群谢提素英必、美亚二人来贡方物,美亚本福建汀州士人谢文彬也。昔年因贩盐下海,为大风飘入暹罗,遂仕其国,官至岳坤(Ockan,泰国阿犹泰雅 AYuthaYa 五朝的四等官阶),岳坤犹华言学士之类。至南京,其从子瓚相遇识之,为织殊色花样段疋贸易蕃货,事觉下吏始吐实焉”。^①弘治十年(1497)充贡使来华的奈罗是汀州府清流县人:“暹罗国所遣通事奈罗,自陈为福建清流县人,因渡海飘风,流寓暹罗。今使回,便道乞展墓,依期归国。许之”。^②到了清代,从汀州经闽粤港口渡海去南洋谋生者,更是日渐其多。此外,由于台湾归入中国版图,开始大规模开发,也吸纳了来自汀州的海洋移民。

汀州的海洋移民和向海洋发展区域的陆路移民,几乎是同步展开的。这可从现存的汀州族谱中得到证明。如:

永定县太平里悠湾乡村尾王氏,始祖均德公,“王巢作乱,避于宁化石壁峒,立基业于武平县”。五世开基村尾,“始祖之由来以及上祖生卒之年月,俱莫明矣,以世代推之,来自元季间”。^③明代开始向外分衍,入清以后,外迁者更多。据悠湾《王氏宗谱》载,^④向海洋发展区域和海外移民的情况是:

十四世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

② 《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九,弘治十年九月辛丑条。

③ 悠远《王氏宗谱》,王秉权:《王氏宗谱序》。

④ 悠远《王氏宗谱》,抄本,龙岩红坊镇联合村王松源藏本。

志英公，移居仙游县。

志阶公，移居广东。

志赞公，移居安溪长坑。

志其公，志万公，兄弟移居安溪县长坑。

志任公，移居广东大鹏所。

志通公，移居同安县马历(?)巷。

志觐公，志崇公，兄弟移居广东大鹏所。

十五世

仕开公，移居仙游县。

仕观公，往外六昆番(今泰国 Nakhon Si Thammarat)，卒。

仕礼公，往外福州，卒，无传。

仕兴公、仕全公、仕满公，三人俱移居安溪县长坑。

仕华公、仕辉公，子移居广东大鹏所

仕耀公，生一子，移居广东大鹏所。

仕娘公，仕益公，兄弟移居同安县马历巷。

十六世

必奇公，往外交喇国，又往渡机汶番，船中被番谋杀，无稽。

必超公，长四子移居，与公同往广东未回。

必登公，往番渡机汶，被贼所伤未回，无稽。

必祯公，字振祥，公生于唐熙己未年(1679 年)，至庚寅(1710 年)往台湾，外卒。

十七世

鸣山公，生一子名庆聪，往番邦，外卒无传。

十八世

庆唐公，往台湾，外卒。

庆连公，字富招，往外台湾。

庆和公、庆穆公、庆典公、庆旺公，俱往台湾，外卒无传。

鼎龙公，往台湾，外卒无传。